

杭州市哲学
社会科学规划
课题研究成果

明代杭州研究

(下册)

杭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杭州文史研究会 编

杭州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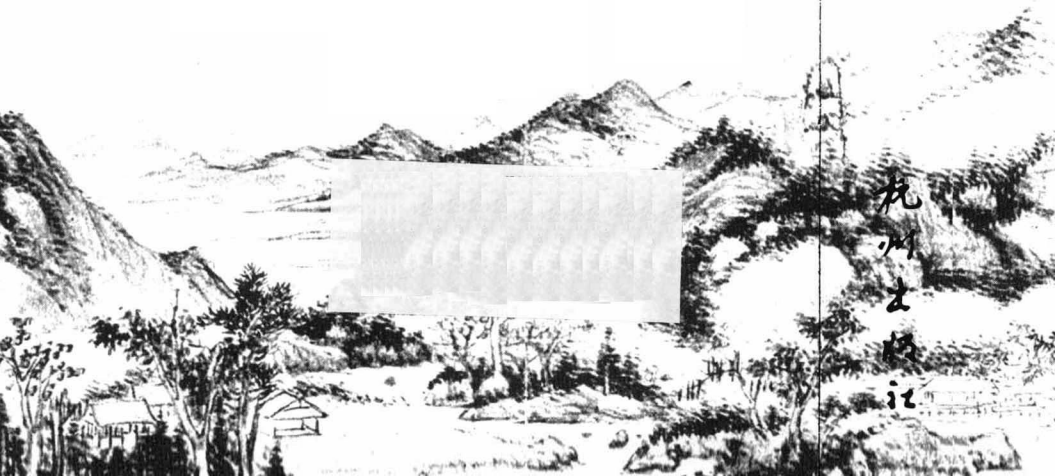
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研究成果

明代杭州研究

(下册)



杭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杭州文史研究会 编



杭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明代杭州研究 / 杭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, 杭州文史研究会编. —杭州: 杭州出版社, 2009. 1
ISBN 978-7-80758-091-1

I. 明… II. ①杭… ②杭… III. 杭州市—地方史—研究—明代 IV. K295.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TP数据核字 (2008) 第085017号

明代杭州研究

杭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杭州文史研究会 编

责任编辑 陈晓蓓 屠文镛

装帧设计 杭州乾嘉文化艺术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 (杭州市曙光路133号)

电话: (0571) 87998167 邮编: 310007

印刷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印张 18.125

字数 421千

版次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80758-091-1

定价 68.00元 (上下册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目 录 (下册)

Contents

- 论明代杭州藏书的文化背景及私人藏书/顾志兴/1
- 明代杭州史学成就述略/钱茂伟/20
- 试述万历《杭州府志》编修特点/张英聘/46
- 明代杭州西湖的治理/孙 跃/63
- 明代西湖私家园墅浅谈/刘春蕙/74
- 明代杭州道教宫观初探/林正秋/96
- 莲池、藕益两位净土宗祖师与明末社会/黄公元/125
- 明代杭州天主教与杨廷筠/周 燕/158
- 葛寅亮生平、著述考述/何孝荣/174
- 试论洪钟/李建军/213
- 明代西溪名人洪钟及祖孙传略/林正秋/227
- 毛文龙功过简评/李冈原/236
- 明代杭州大事记/244
- 后 记/279

论明代杭州藏书的文化背景 及私人藏书

顾志兴

内容提要：明代杭州藏书出现了繁荣的局面，这和社会文化背景是紧密相关的。明代杭州经济、文教事业发达，兼之刻书和图书流动业亦十分发达，对杭州的藏书业起了积极的作用。这一时期杭州私人藏书的特点是出现三代、四代、五代的家族藏书，这在别的城市较为少见。高濂的藏书理论的出现，表明杭州藏书已进入成熟阶段。

关键词：明代 杭州 藏书 家族 理论

明代杭州私人藏书出现了繁荣的局面，较之前之元代影响更大。这和当时的经济发展和文教事业的发达对藏书的促进是分不开的。同时，明代杭州刻书业发达，现在仍能考知的书坊有近三十家，遍布杭州城内通衢大街和委巷小里。其时图书流通环节也十分通畅，致书容易，因而出现了大批藏书家和藏书楼。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明代杭州出现了三代、四代、五代的家族藏书家，使杭州藏书氛围更为浓厚，人所艳羡。这种情况是别的城市较为少见的。

明代万历间杭州藏书家高濂不仅藏书丰富，且在《遵生八笺》中明确提出了藏书为读，读书为用；在版本鉴定上，也对如何辨别宋元版书留下了真知灼见，并且对书商伪造宋版书的种种手段加以揭露，这一切不仅在当时，即使在今天对藏书爱好者也有积极的借鉴作用。

一、社会文化背景

（一）经济发展对藏书的影响

明代经济发展中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手工业生产水平的空前提高，造纸业的发达和印刷工艺改进这两项，对书籍这种文化商品的生产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。浙江是明代造纸大省之一。其时印书普遍用竹纸，浙江嫩竹原料丰富，小纸坊即能制造。同时套印和恒板、拱花等印书新工艺亦已发明问世，使书籍印制更为精美，浙江湖州以闵齐伋、凌濛初为代表的多色套印本是其杰出的代表。明代浙江书籍已成为一种商品进入市场和千家万户，甚至远销海外，如日本等国。

考察杭州明代私人藏书事业，可以发现，商品经济繁荣的杭州城区和城郊的一些著名集镇，与藏书事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。这些经济发达之区，常常是藏书集中之地，这并非偶然的巧合，经济的发展和当地人文条件相结合，为藏书事业创造了物质条件，准备了肥沃的土壤和适宜的温度，而手工业中的造纸和印刷工艺的改进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。

（二）文教发达促进藏书事业发展

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本人文化程度不高，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，在征战夺取政权过程中，先后礼聘李善长、冯国用、叶深、章溢、刘基等，设礼贤馆以示优厚，发挥他们的作用。建都称帝后，朱元璋采用荐举、兴办学校、科举考试来选拔官员，以巩固大明王朝的统治。

杭州除按规定荐举人才外，还根据明政府要求，府、州、县都设立了府学、州学、县学，乡村办有社学，并根据规定选送诸生入

国子监深造。此外，明政府规定国家实行科举考试，以八股文取士。由于明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读书的政策，故而明代求学、读书风气颇盛，出现了明初浙江天台学者徐一夔在《始丰稿》中所说的“家有弦诵之声，人有青云之志”的风气，书籍需要量大增，城市和乡村“书香门第”、“诗书传家”、“耕读世家”成为一种社会现象，藏书成为一种社会风尚。这对杭州有明一代藏书事业的发展直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
（三）刻书业、图书流通业和藏书传统的影响

明代杭州官私刻书极盛，无论府、州、县各衙署均有刻书。其时刻书制度和元时不同，比较开放，约束较少。元代文人著作梓行，需地方绅士呈词学使，学使若加否决，则不能刊稿。学使如若认可，则由学使备文咨部，需部议批准，始得刊板，反之亦罢。明代全无此等限制，故私人刻书和书坊刻书极盛。

随着刻书业（出版业）的发达，明代书籍流通业十分兴盛，杭州等地的书肆业和湖州“书船”的活跃，为藏书事业带来了方便，促进了藏书事业的发展。据明胡应麟研究，杭州为明代全国四大书籍荟萃中心之一。大街不必说，即使在小巷之中亦有书肆，有时还能买到“奇书秘简”，对此胡应麟曾有亲身经历：他曾在杭州僻巷见宋张文潜《柯山集》抄本，此书“印记奇古”，“装饰都雅”。其时胡应麟身未带钱，愿以绿罗二匹并解所穿乌丝直绀青蜀锦半臂与之交换，主人不允。后商定价格，约定次日前去交易，但夜来邻火延烧书肆，此书已成灰烬。胡应麟失之交臂，痛惜不已。这仅是一例而已。

明代杭州藏书事业的繁荣，和杭州藏书素有藏书传统亦有关系。自宋元以来，杭州藏书代不乏人，经元末战乱，入明后经休养

生息，天下太平，加之经济发展，一些文人学士、藏书之家自不肯丢掉这个优良传统。

综合以上原因，明代杭州藏书事业得到空前繁荣自是水到渠成的了。

二、主要私人藏书家

明代全国私藏书以浙江、江苏最盛。我国藏书有四大系统，即官府藏书、私人藏书、书院藏书、佛寺道观藏书。但笔者以为私人藏书是其主流。论浙江私人藏书，金华宋濂为开一代风气者，在中国藏书史上有重要影响。嘉靖、隆庆之世，以宁波范钦、嘉兴项元汴为代表的藏书家群体异彩纷呈，万历、崇祯间的绍兴祁承燾以藏书和藏书理论称名于世。素有藏书传统的杭州，则以世代藏书为其特点。

明代杭州府五世以上私人藏书主要有以下数家：

（一）凌云翰尊德堂五世藏书

凌云翰（1323—1388），字彦冲，人称柘轩先生，钱塘（今浙江杭州）人。元至正十九年（1359）中举，以道阻不及赴都，授兰亭书院山长。明洪武十四年（1381）以荐举召授四川成都教授，后谪居西荒卒。云翰工诗，《关山雪霁图》为其代表作之一，著有《柘轩集》。

凌云翰平生好学，喜藏书。丁申称其“博通经文，潜心周孔之书，处一室，左图右史，讲习其间，研几极深，严寒盛暑不辍”^[1]。

凌家世代藏书后继者为：

[1] 丁申《武林藏书录》卷中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。

凌鹄（云翰子），生卒年不详，字正斋。继承家学，明初荐举为通经人才，后以母老乞归杭州，以诗文、藏书为乐。

凌文显（云翰孙），不坠家业，毕生读书、藏书。

凌昱（云翰曾孙），明景泰元年（1450）举人。整理其曾祖云翰遗作诗文若干卷，命子凌暹缮写成帙，名《柘轩集》，瞿佑作序。

凌昱因其曾祖云翰喜藏书，所蓄前代典籍甚富，加上祖凌鹄、父凌文显及凌昱自己生当明代盛时，数代不断增益家藏书，故瞿佑称其家收藏图籍自经史及诸子百家，以至稗官小说，靡不兼收并蓄，遂为明代杭州藏书世家。凌昱于杭州湖墅夹城巷筑别业，内有尊德堂藏书处，为别业之最佳胜处。凌家自云翰藏书，历凌鹄、凌文显、凌昱而为四世藏书，传至昱子凌暹则至少延续五世。

（二）张翱世代藏书自明绵延至清

张翱（1394—1476前后），原名珍，字济时，一字羽皋，号介然，仁和（今浙江杭州）人。先世为河南开封人，南宋时，祖先随宋高宗南渡，落籍钱塘（今杭州），后徙居仁和睦亲坊（今弼教坊一带）。张翱自幼颖异，喜读书、藏书。人称其探索隐奥，所学颇广，“五经六史，靡不究心，尤精《周易》，暇时涉猎九流百家之书。至于推步天文，往往奇中，或占风望气，其应立见，若神授者”^[1]。

张家原本丰厚，家饶资财，至张翱父张彬时，富甲一方。家中析产，张翱将应得之财悉以归兄。唯日夕读书，钻研学问，以故时人多所推重。明宣德间（1426—1435）两广不宁，浙人潘中丞前往

[1] 丁中《武林藏书录》卷中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。

视事，素仰张翱知兵事，遂邀同行经略，助其平定两广。两广平后，潘中丞欲上疏荐举，张翱志不在仕途，回杭州家中专事著述，尝自作述志诗云：“有意欲尝千日酒，无心去傍五侯烟。夜寒荷叶杯中饮，春暖梅花帐底眠。”^[1]

张翱后代颇多读书而知名者，略有：

张应棋（张翱曾孙），曾中进士，而后官主事。

张应祐（张翱曾孙），以乡荐而官通判。

张瀚（张翱玄孙），进士出身，后擢知府，终官吏部尚书，谥恭毅。著有《台省疏稿》、《松窗梦语》、《奚囊蠹余》等。

张濂（张翱玄孙），进士，后擢通政使。

张洽（张翱玄孙），进士，后擢用为通政使。

此外，玄孙张洵、张溥则以乡荐而候春官。其他诸玄孙中皆学有所长，怀珍待聘。

自明至清，张翱一族为杭州典型的仕宦世家。

张氏藏书世家所藏，一为族人著作，如《东川集》、《不惑堂文集》、《宠寿堂诗》、《燕堂文稿》、《西园诗集》、《青林文集》、《河清集》、《秦亭集》、《白云集》、《冰崖诗》、《两峰诗》、《见心堂诗》、《两闲书屋集》等，二为经史子集四部书。由于张翱一族自明至清近四百年而不衰落，日积月累，所藏之富，甲于武林。

张氏藏书楼建于水中以防火，其内按经史子集四部排列，井然有序。进楼则以小舟渡水而入。申时（下午三至五时）后即严禁进入藏书楼，以防火。

[1] 丁申《武林藏书录》卷中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。

（三）洪氏五世藏书

明代自成化至崇祯近一百八十年来，杭州有洪钟家族五代藏书。

洪钟为南宋名臣洪皓后裔，洪皓自金国归后，高宗赐第葛岭，其次子洪遵一族居西溪，后子孙繁衍，遂为钱塘望族。旧日余杭区五常乡洪家埭洪氏宗祠有“宋朝父子公侯三宰相；明纪祖孙太保五尚书”一联，上联即指洪皓及其子，下联即指洪钟及其祖、父与后裔。从藏书的角度说，洪皓是西溪洪氏藏书的开创者。

洪钟（？—1524），字宣之，钱塘（今杭州）人。明成化十一年（1475）进士，历官刑部、工部尚书，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。赐玉带，出总川、陕、湖等省军务，卒谥襄惠。《明史》有传。

洪钟一生喜藏书，受祖辈及其父洪薪影响颇深。明屠勋《太和堂集》（见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）中收录之《赠承德郎、刑部主事洪公、封太夫人姚氏行状》中言，洪薪歿后，姚夫人常教诲其子洪钟云：

汝父存时见汝聪明过人，每喜语人曰：“人以积金遗子孙，吾教子一经耳。”每得当代名公文稿，必亲手录以为汝式。又尝私语汝曰：“吾家自安抚公以来，累世积德，然未有显发者，虽吾祖与父大负才美，而不获见用，吾亦偃蹇若是。所以显发而昌大门户者，尚望于尔曹也。汝能记之乎？”

洪钟有赠子诗云：“汝父慕清白，遗无金满籝。望汝成大贤，唯教以一经。经书宜博学，无惮历艰辛。才以博而坚，业出勤而精。”^[1]于此可概见洪钟对其子期望，遗赠非金而是经书。此诗实

[1] 参见《明史》卷一八七。

是转述洪薪遗教。

洪澄，字静夫，号西溪，洪钟子。正德五年（1510）举人，曾官翰林，其所拟诏诰，文字雅贍，深得大学士商辂之器重，继父志，亦爱藏书。

洪梗，字子美，号美荫，洪钟孙。因恩荫任詹事府主簿。继祖、父藏书，所积甚富，在西溪有三瑞堂藏书楼。其于藏书之外，从事校刊，为明代著名刻书家。丁申《武林藏书录》卷中称洪梗藏书“承先世之遗，缥緗积益”，有《洪子美书目》。丁申又称其刻书“既精且多”。洪梗的藏书、刊书活动主要在嘉靖年间（1522—1566）。其在杭州仁孝坊（俗称清平巷）有刻书处，所刻书均署“清平山堂”。

洪梗的藏书活动，清末民初丁立中《西溪怀古诗》卷上《西溪怀洪美荫》咏之：

美荫生来玉宇清，能绳祖武振家声。

古文选录英华萃，路史雕刊校勘精。

架插千编罗卷轴，堂开三瑞集簪缨。

园林增筑西溪胜，闲与山农课雨晴。

洪瞻祖，字诒孙，号清远，洪钟曾孙。瞻祖为万历戊戌科（二十五年，1598年）进士。由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，官至右都御史，巡抚南赣，著有《清远山人稿》、《西溪志》。瞻祖继祖业绩有藏书。

洪吉臣（字载之）、洪吉辉、洪吉符三昆仲皆为洪钟玄孙。吉辉万历四十六年（1618）乡试中举。吉臣崇祯六年（1633）参加顺天乡试中举，十三年（1640）会试中副榜进士，官德安府推官，有德政，曾捐俸赈济十七次，民得活，有歌纪其德。所著有《明文

裔》、《二十一史识余》、《学圃萱苏》、《警世录》、《后场类典》、《群书备考》等。洪吉臣、洪吉辉、洪吉符皆有文名，喜藏书。时人称之“城西有三洪，英英文字雄”。遗泽所至，清著名戏剧家洪升“学海”藏书颇富。

丁申《武林藏书录》卷中称：“洪氏自宋忠宣公迁杭以来，青箱世守，代有科名。”后代子孙自清以来至咸丰犹代有人出，以为“世泽贻谋，罕有伦比，附记之，以征诗书之报矣”。“诗书之报”未必，但藏书人家富传统，代出文人倒是确然如此。

（四）卓氏水一方、传经堂四世藏书

明代杭州余杭塘栖镇有卓显卿水一方藏书楼名闻于世。塘栖卓氏原籍浙江瑞安，其先祖卓敬《明史》有传。洪武二十一年（1388）进士，后任户部侍郎。建文帝即位，燕王朱棣有窥鼎意，卓敬密疏移藩。朱棣称帝后，卓敬被夷三族。其堂弟卓敦闻讯，自瑞安辗转逃至仁和塘栖（今杭州余杭区塘栖镇），入赘宋氏，易名哲三，为塘栖卓氏之始祖。至万历年间，后代始复卓姓。其时塘栖卓氏已富甲一方，成为当地望族。

卓氏藏书，始于塘栖卓氏七世卓擢。卓擢初名显卿，字襄野，号寓庸，别号入斋。幼时从学名儒许敬庵，以习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六经知名于时，精研理学，学探濂洛关闽。尝言天下理之精者，俱“六经”所有，儒者不信“六经”，则其学不坚。其堂名称“传经”。家有万卷楼，为其著述之所。万历年间又建水一方别业于镇南，为读书、藏书、著述之所。水一方藏书甚富，其“水一方”篆文印章，至今尚存卓氏后人处。

卓擢后代亦能继先人之业，雅好藏书。卓擢有子发之（1587—1638），字左车，号莲旬。崇祯六年（1633）副贡，以文章负重

名，知交倾东南，博究缥緲，建传经堂以延四方俊彦，著有《水一方诗草》、《澹篱堂集》、《明画拾遗》等。

卓人月（1606—1636），字珂月，号蕊渊，卓桴之孙，发之之子。崇祯二年（1629）加入复社，八年（1635）拔贡，著有《蕊渊集》、《蟾台集》、《古今词统》等。

卓天寅（1627—1695），字火传，号亮庵，卓桴曾孙，卓人月之子，太学生。幼负才名，蜚声庠序。明末学者倪元璐、钱谦益、吴梅村等皆所推重，又问业于黄道周。为诗宗盛唐。卓天寅为明代卓氏藏书事业发扬光大者，重建卓氏家祠传经堂藏书楼于广济桥西，规模较前伟且广，楼阁相望，廊榭萦绕。藏祖考等三代万卷藏书，亦为刊书之所，四方士人至，皆馆之，读书其中。又常与朋友论学其间。又有月波楼、芳杜洲等园林别业，藏书达数万卷。著有《静镜斋集》。

卓氏传经堂藏书楼，贮明代卓氏数代藏书，楼成之日遍征名宿题咏，吴绮、李文胤、陈祚明、计东、余怀、程邑、朱彝尊、郑梁、徐乾学、杨鸣鹤、严我斯、姜宸英等皆有题记及诗作，其中吴绮所作《传经堂记》称：

苍雪之东百里，环山而秀，回水而清，桑麻平野，间
闲辐辏曰塘栖，固杭、湖二郡接壤，而南北之孔道也。塘
栖之西有广济桥，里名长桥，水陆络绎。桥之西，辽廓平
旷，荡若无外，有楼观亭榭，萦带騫腾者，卓氏祠宇在
焉。其堂曰传经，为火传氏天寅祀其曾祖父入斋、莲旬、
蕊渊三先生处。后乃凿泉为池，插竹为篱，松柏花石，旋
拱其际。堂之旁更为三楹，曰“只是读书”。池之中有
亭，曰“水心云影”。循池而南，方阑如廊如带，曰“且

吃茶”，昔董宗伯公思白所题也。廊之前有亭，曰“泠泠来风”，更转而陟数级以上，曰“相於阁”，蕊渊先生因阁有诗，火传因而属王吏部西樵题之。南可眺皋亭、黄鹤，西则武康封禺诸峰皆在目焉。阁之下，小构数椽，树以桐阴，曰“无事此静坐”，入斋先生旧额。欲其燕居默处，端坐凝思。绕廊数武，界以短垣，曰“桥西草堂”，其上以贮三世遗书，下以俟子孙讲读其中。余顾而乐之。水之流者若蓝若镜若练若縠，山之峙者或伏或骛或盘或踞，以致危樯劲橹之往来，渔歌牧笛之互答，清风欲生，翠烟自留，斯皆卓氏之伟观与？……^[1]

又，严我斯《题卓氏传经堂兼寄火传》诗有句云：“此堂岿然号传经，遗书万卷留讲席。”^[2]以上诗文可窥当年卓氏传经堂兼具江南园林建筑特色，又是一代藏书名楼。

卓氏为塘栖巨族。卓擢族人卓尔康（去病）为万历举人，藏书亦颇丰，曾于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）刊刻《卓光禄集》。

卓氏传经堂及四世藏书，于清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太平军入杭时遭兵燹。

（五）吴氏宝名楼三世藏书

明万历至清康熙间杭州有吴继志三世藏书，声名颇著。吴继志，明钱塘（今杭州）人。曾官云南越州卫经历。平生好聚书，且勤于抄录，据称“秘阁之钞逾万卷”。后因其子鼎贵，家有官

[1] 卓宁鹗：《塘栖卓氏家系暨文录》，1996年铅印本，又见丁中《武林藏书录》卷中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。

[2] 同上。

廷赐书，一时有与绍兴祁承燦澹生堂、常熟钱谦益绛云楼藏书相等之说。

吴太冲，字默真，继志之子。吴太冲于崇祯三年（1630）中进士，选翰林院庶吉士，授检讨，改编修，后为南京国子监司业，转右春坊右中允（太子属官，审核太子给皇帝奏章等事），亦好藏书，以职务关系，常得皇家赐书，所赐书皆轴带帙签，颇精美。

吴农祥、吴农复为吴继志孙。吴农祥（1632—1708），字庆伯，号星叟，一号大涤山樵。曾构筑宝名楼藏书室于别业之梧园。吴农祥、吴农复相约登楼读书于宝名楼。为不受干扰、专心致志读书，兄弟俩除去楼梯，相诚不闻世事，尽发祖、父及兄弟所藏书以读之。清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，吴农祥应荐试博学鸿儒。吴农祥著有《萧台集》、《梧园杂著》、《流铅集》、《诗余》等，文名颇著，与吴任臣齐名，杭人呼为“二吴”。吴农复著有《来庵存稿》。清初吴家老宅入围屯中，唯图籍无恙，兄弟俩遂将藏书迁藏于孩儿巷之梧园。

明代杭州私人藏书，除凌云翰、张翱、洪钟五世藏书、卓氏传经堂四世藏书及吴氏宝名楼三世藏书，以世代绵延为其特色外，著名的藏书家尚有以下数家，其中尤以高濂藏书及其藏书理论引人注意。

（六）沈仕喜藏书及法书名画

沈仕（1488—1565），字懋学，一字子登，号青门，又号野筠，别署青门山人、东海迷花浪仙，仁和（今杭州）人。善诗、工散曲，又擅山水人物。性疏放，喜漫游，又嗜藏书，所藏尤以法书名画著称于时，然淡于功名，不求仕进。明嘉靖间客游京师，老迈始归故里，以鬻画为生。著有《沈青门诗集》及散曲集《唾绒

窗》。

沈仕所藏书与法书名画后散出，下落不详。

（七）郎瑛藏书

郎瑛，字仁宝，仁和（今杭州）人。生年约在明成化二十三年（1487），卒年不详。据丁申《武林藏书录》卷中称，他“素有疾，淡于进取”，有人关心他的前途，郎瑛回答：“吾已委身载籍矣，尚复与少年竞笔札耶？”丁申称其藏书“家所藏经籍书史文章杂家言甚盛”。明代曾任浙江布政使的陈化贤为郎瑛《七修类稿》作序时说：“吾闻生笃志好古，遇奇书异帙，辄购求之，至倾资罔吝，故学富而家日贫。”清乾隆四十年（1775），杭州周桀在《重修〈七修类稿〉序》中也说郎瑛“藏书富有杂家”。根据这些点滴记载，可知郎瑛所藏多杂家子部书。^[1]

郎瑛平时专心读书，整日正襟危坐，日夜讽诵，含英咀华，喜读书而不囿于前人所见，常“刺瑕同类，辨同异得失”。著有《萃忠录》、《青史衮钺》、《七修类稿》，前两书久佚，今存唯《七修类稿》一书。

（八）高濂妙赏楼藏书及其藏书理论

高濂字深甫，号瑞南，明钱塘，一说仁和（今杭州）人。生卒年不详，仅知万历初尚在世。高濂是著名戏曲家，著作有《节孝记》、《玉簪记》等。《玉簪记》一剧影响较大，该剧述道姑陈妙常和书生潘必正冲破封建礼教而倾心相爱的故事，其中如《琴挑》、《偷诗》、《秋江》等几出戏至今还在京剧和各地方剧中盛演不衰。

[1] 参见郎瑛《七修类稿》，中华书局1959年版。